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博士文库

杨建新 主编

# 古村社会变迁

## ——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

● 谭必友 著

GUCUN SHEHUI BIANQIAN YIGE HUAYUQUN DE FENXI SHIYAN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博士文库

杨建新 主编

# 古村社会变迁

——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

◎ 谭必友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谭必友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6

ISBN 7-105-07069-2

I. 古... II. 谭... III. 土家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63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5.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总 序

### 努力提高研究生的“三创”水平

杨建新

《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文库》是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少数民族史在校博士生的专著丛书。对博士生,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在学期间就出专著,但对他们撰写专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导师,我认为给予一定的支持,是很必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能撰写专著的博士生,大多都是有多年教学、研究和工作经历,且多为有高级职称者,他们有学识方面的积累和能力;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对培养博士生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简单来说,就是要把研究生培养成有创造精神并具有创造能力的人。

20世纪90年代,提高和培养大学生创造精神的紧迫性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学前教育到博士研究生的教育,都面临着在“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旗帜下,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目标、教育理念的问题,以至面临着教育体系的大潮。相对来说,中小学在这方面已有较大突破,而研究生教育反映相对迟缓。在人们的常识中,研究生教育本身就是研究性学习,是研究生自己在科学研究中完成学习任务,或倒过来说,在学习过程中完成科学研究任务。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对当代的研究生培养已远远不够!

因为,问题已不仅仅是完成研究任务或学习任务。对研究生学习阶段来说,时代对他们提出的根本要求就是成为创造型人才!研究生必须具备创新意识,有对创新性机理的认识和理解,有创新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法,有从事创新性实践的积极性等几个条件。总结我自己的长期以来的研究生培养经验,我认为在培养创造型人才过程中主要是引导研究生提高创造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培养创业素质。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提高研究生的“三创水平”。

创造意识,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应具有以下几个认识:

当代科学家用大量科学实验证明,创造能力不仅仅是人类的群体能力,而且,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创新能力。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从大的方面讲,它关涉国家或民族兴亡;从小的方面讲,它关涉个人能否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在此也可以套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对人的潜在创造能力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实践问题。对人的潜在的创造能力的开发,提高每一个人的创造意识,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家、社会学家探讨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管理学家为那些企图实现社会组织重组或扩张的管理人指出的不二法门,更是当代主流教育的一个核心话语。

创新是当代各学科发展的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促进了当代各个学科快速发展,整个科学世界(包含社会科学)的图景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众多知识综合生长点和学科结合部的出现,是当代各学科发展面临的共同现象。在最近几十年以来,科学知识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更有人说,20世纪60—7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已经超过人类历史上科学发明的

总和。传统的学习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显然已跟不上科学发展的要求。因此,创造性的学习,在科学研究中追求创新、实现创新,成了这个时代各学科对它的研究者、学习者的根本要求。

创新是当今社会上各种职业对人才的要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伴随这个时代的到来,社会上各种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从传统的流水线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个性化、创造性的工作,成为这个时代各个职业对人才要求的一个响亮的口号。研究生同样要接受各个职业的选择。提高“三创水平”,是我们学习中的重要目标。

创新是振兴中华民族的要求。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就从民族振兴的高度,指出了“创新”的意义。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最终要通过他所培养的人才群体来实现。研究生教育是我们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主要途径或手段之一,研究生将成为我国高级人才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问题。最近,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我国人才工作还存在不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创新型人才短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关系到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二

怎样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对于研究生来说,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是教育界正在极力探索的一个紧迫而严肃的课题。达成理论上的共识,也许要相对地容易,但要取得实践的成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综合当代各个教育家的看法,我们不妨这样说,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打好三个基础。



### (一)创新的知识基础

没有一个牢固的知识基础,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源。对研究生来说,拥有的知识能否成为创新的基础,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知识结构要合理。前面我们说过,当今的科学正向综合化和整体化趋势发展。科学研究的哪怕很微小的创新都是在几个学科知识合作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但应该明确,结构合理,不等于知识的面面俱到。以某一个学科为主,其他学科为辅,建构自己有特色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这样的知识结构才是合理的。第二,知识要系统。最少,系统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必备条件。有一种人,听起来什么都知道,显得很博学,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东鳞西爪、支零破碎的常识,形不成系统的知识。在这种常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所创新的。第三,知识的内容要前沿。当今,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新观点不断在出现,要想在学科领域有所创新,必须掌握和站在学科前沿,否则,在当今的学术领域想要创新,那只能是梦想。只有保持知识的前沿性,知识创新才有可能,科学研究才能保持先进性。

### (二)创新的思维基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科学研究讲究理论思维。首先,要勤于思考,一个研究人员,脑子里随时有问题需要回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基本素质。研究生是什么?研究生就要满脑袋是问题。其次,要善于思考。也有这样一些研究者,他们虽然有满脑子问题,但却没办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加工,科研最终没办法取得突破。从当今的科学水平来讲,善于思考,主要是指能够熟练运用三种思维,即理性思维、辩证思维以及逻辑思维。

### (三)创新的技能基础

技能基础简而言之,就是表达系统、信息系统以及外语系统。(1)表达系统就是要学会多种表达方式和多种表达手段。当代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以及一体化,要求科学研究成果经常要用多种

方法表达。譬如民族学研究,就不但要用传统的文字记录的方式表达,而且要用到先进的音像技术、实物展示、文化表演等等多种手段,不但要利用传统的文本,而且能广泛使用多媒体、网络等载体。(2)信息系统主要是指研究者围绕自己的科研建立一个获取信息的途径及手段系统。信息系统灵畅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科研的效率。(3)外语系统。外语既是研究者获取外国同行前沿信息的重要手段,又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推向国际的重要手段。这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 三

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坚,不但要学会创新,而且要培养创业素质。创业是每个研究生都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从国家的要求来说,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新一代具备良好的创业素质。对每一个研究生来说,要成就自己的事业,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业素质。创业素质是一个人创业能否成功的桥梁。创业素质的内容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们暂且避开它的内容,在此简略谈谈它包含的三个根本要求。

首先,坚忍不拔、不怕失败的意志。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要面对重重困难,都可能面临无数次失败。追求的事业越大,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没有一种坚忍不拔、不怕失败的意志,就很可能被困难吓倒,从而半途而废。

其次,团结共进的胸襟。居里夫人独自发现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工作,都需要团体的共同努力,团结共进是创业者的基本胸襟。用时髦的话来说,叫发扬团队精神。

最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实事求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我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实事求是的作



风。无论是在一般的社会性工作中还是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实事求是都是一个基本准则。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追求真理,更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教育部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最近几年,博士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围绕中心的科研课题,博士研究生们做了大量科研。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民族学博士文库是这些科研成果中的一部分。这些作者,大多数都有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所写专著,也大都是在他们长期科研积累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尽管其中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总体上,这套书是成熟的,有着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学风扎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原本是想详细地向读者介绍这套丛书,却谈了一些对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权且代序吧。

## 导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话语群的视角

(1)从文化说起;(2)用“文化”去解读农村的努力;(3)结构、制度及其他观察视角的弊端;(4)古村的研究缘起;(5)本书关注的理论问题与话语群;(6)基本结论。

### 从文化说起

“文化”一词,是我们这个时代用的最广泛的词之一。它无处不在,它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又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方法,当它作为对象出现时,它几乎涵盖了一切:历史上曾经遗留下来的一切有形(如文物及其他无法列入文物的实物)的东西及无形的东西(以文本记载或现实中人们语言中保留的信息)。在许多学者那里,它几乎成了历史本身或社会本身。但叙述起来,文化与历史、社会又确实具有某种区别。至目前为止,没有人确切地讨论文化与历史、社会的区别。因此,许多研究者为了叙述的方便,便将文化与历史、社会合用,以致类似“历史文化”、“社会文化”,似乎就是历史、社会或文化的异名。文化作为对象时,人们总在讨论历史文化或社会文化,这种含糊性似乎并未影响读者的阅读与思考。相反,这种含糊性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阅读者自我获得确切答案的权力。

这个概念及其含糊性的广泛运用,直接导致了“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到作为研究方法的全面转换。至今,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来探讨文化自何时实现了作为研究方法的转变。近些年来,人们在阐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象时,文化的方法已经很时髦,特别是在阐述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时,它对问题的说明能力几乎惊人的高,基本上是得心应手,马到成功的。就连亨廷顿在解释世界冲突及后果时,最后都直接使用了“文化”,用文化作依据。<sup>①</sup> 亨廷顿的结论引起了中国及伊斯兰社会的强烈反感,但人们并未指出“文化”的研究方法不对,而仅仅辩解说,亨廷顿只是看到了文化的不同方面,以致以点概面,歪曲了事实。实际上,在“文化”下争论这些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天经地义,实则是漫无目标。

如果从英国的方化人类学家泰勒算起,对文化作抽象思考至今已一百多年历史了。有学者对近些年来有关文化的抽象思考做过总结,并列出了5位有代表意义的学者对“文化”分层的观点:<sup>②</sup>

马林诺斯基	费孝通	余英时	李亦园	冯天瑜
物质设备	基本(生物)	物质层次	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	物质文化
语言	派生(社会)	制度层次	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	制度文化
社会组织		风俗习惯层次		行为文化
精神方面的文化	整合(精神)	思想与价值	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	心态文化意识形态

我们列出这个分层表,并非要说明文化是什么,而是从这具有

① 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载《哲学研究》,1994(3)。

② 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14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代表意义的文化分层中,我们会发现文化的方法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尽管5位学者都是非常严格地对文化进行分层(或分类),分出三层或四层。实际上人们在使用“文化”分析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等社会现象时,并不能很好地去遵守学者们所制定的这些层次,而是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交叉使用,以便为人们在“文化”的旗帜下,找到各自的理由。因为大多数讨论者出发时可能是文化,中途就跑到语言、制度、思想传统以及其他地方去了。另一些学者更甚,在文化的遮盖下,实际上讨论到社会行为方式等领域去了。因此,关于社会冲突或社会变迁的分析,有了种种不同的抽象“文化”的观点,但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实质。

也许知识的意义并不是真正地说明对象,则是帮助人们获得理解。因此,在面对社会的复杂现象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获得“理解”的欲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亨廷顿及其反对者运用“文化”说明社会冲突也无不可。在笔者看来,用“文化”实现“理解”的阶段应该受到批判了。特别是我们面对另一急迫的问题,我们更有理由去建立新的“理解”的可能。虽然,我们也可能遭遇“文化”,但是,我们是力求突破“文化”的理解框架,是在具体的层面上来解读我们的对象。因为,随着文化不断地被抽象化,文化完全适合于宏观叙事,适于漫长历史作宏观上说明,一旦遭遇到具体的历史时代,特别是当我们试图更近地去理解一个农村社区在某个历史断面上曾经发生的变化,而且想揭示这个变化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决定因素,“文化”分析框架实在是力不从心。这一点从后面的分析中会看的更清楚。

## 用“文化”去解读农村的努力

中国农村成为学术对象,大约在19世纪下半期。随着西方殖民者在我国的深入活动,西方传教士在我国的传教活动也日益深

人,这些传教士通过长期观察,在19世纪下半期写出了首批有关中国农村的书。但在这些传教士眼中,中国农村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农村的风俗与一些愚昧和贫困。而这些现象正成为殖民者加大殖民力度的理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务运动遭到彻底失败后,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的社会科学思想,掀起了新一轮社会运动,这一场运动后来被命名为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中国农村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这时的研究是放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框架里来解读的。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研究。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是它的继续,只不过想把它做得更彻底。真正独立的学术意义上的农村研究是在社会学中国化之后,20世纪20年代有了一批初期的调查;到了30年代,农村成为“文化”视角里的解读对象。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高水平,可惜这个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遭遇了30年的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重新以农村为对象,经过20余年的努力,他们重又用“文化”认真地把中国读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出的成果相当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都在“文化”的感召下,积极地去解读农村。一时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成为最为普及的解读模式。许多学者把在中国农村遇到的问题归因于“传统文化”的缺陷。因此,从“文化”入手观察农村便极易将当今农民的命运看成是农民自身的“文化”造成的。这是多么可怕的结论!但在当年却曾经是非常盛行的结论,在当时人的意识里,这种观点被认为是非常坚实的一种观点。实际上,当我们一进入农村社区时,从“文化”的角度是很难将“传统”与“现代”划分开的。许多学者试着从一些具体因素特别是“价值观”等入手,去区分传统与现代,并按照思辨的方法努力构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与通道。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分,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获得对社会的理解,但问题是社会变迁总是连续不断的。因

此,当我们试图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了解我们对象时,使用“传统—现代”模式,具体问题常常变成了抽象问题。“传统—现代”模式并不令人满意。总的来说,以上情况提醒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解读角度及新的解读方法,我们才有希望清楚明白地描述在我们眼前正发生的与即将发生的,或明显或潜在的,连续不断的社会变化,并体验这个变化带给人们的喜怒哀乐。本文试图使用“话语群—行为”的分析模式(或者叫话语社会学),来描述农村社会在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这仅仅是一个实验。

## 结构、制度及其他观察视角的弊端

关于乡村变迁的文化解读,终归是有缺陷的。因此,一部分学者沿着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方向继续向前走,从社会关系到社会结构的方法,探讨农村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然而,这种研究的弊端很快也显示出来。在结构中,我们看到的要不是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关系,要不看到的是资源、市场、效益等的配置关系。可是,处于互动中的各色人等都退隐到结构的背后,我们既看不见他们的表情,更看不见他们的思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尽管在结构中,人相当无奈,但人是有反应的,有时候还会很强烈。这种反应也在引导社会变迁,尽管它不一定很合目的。

在结构论之后,是21世纪以来的最近这几年,社会上有许多学者开始热衷于从制度设计角度来讨论问题。<sup>①</sup>在这些学者看来,“三农”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造成的。从他们的立论与依据来看,这样说,确实是说的过去的。但制度论的缺陷很快也会显示出来。制度论者把“三农”问题完全归结到制度的设计者身上。那我们的

---

<sup>①</sup> 李昌平:《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美德人生》网:www.mei-de.org.

农民在这个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农民作为“三农”问题中的主体，在制度论者中间肯定有一个角色定位，但制度论者却没有回答。这就是我们在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依然不能满足于制度观察的原因。尽管制度观察成为 21 世纪农村研究的某种主流，我们还是要及时寻找新的表述视角。

当然，也有一派学者，坚持不懈地从技术层面去观察农村变迁，将“三农”问题归结为技术方面的原因。举例说，有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是教育问题，是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落后的原因。另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环境、交通、信息等问题，因此主张从修路、通电做起。还有人认为是农村产业结构问题。更有人别出心裁，认为“三农”问题是乡政府（及其他机构）干部太多的原因。技术上的研究确实很有必要。但我们关于乡村变迁的观察不能停留于技术。相对于文化、制度、结构等因素来说，技术还是更为表层的要素。

在发现以上诸多困惑之后，促使我们深入去探讨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更根本因素。这是我们要建立“话语群—行为”分析模式的初衷。我们设想：农村（农民）是处在这样一个由历史及现实组成的社会之中，各方（或各阶层）人士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将这些表达凝固在各种政策及法律制度里。这是一个多方互动的体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很难说应该由谁来负主要的历史责任。这个多方互动体系，本质上可以说成是一种结构或别的什么，但我们很难揣摩到。不过，其表现于外，则是一个庞大繁杂的话语体系，包括法律、政策、学术理论、艺术语言、个人语言、甚至社会怨言（社会传言）等等。我们要真正读懂其中真谛，必须从这些相互关联的表达入手，才能一步步去寻找历史的真相。然而，这个话语体系也可以看做人类历史过程本身，是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全表达的，更别说彻悟。我们只好选择一个村落的变迁来将这个相互关联的表达梳理清楚，同时也更好地描述我国农村变



迁的真相。这是“话语群—行为”理论的目标。成功与否，只有在以后各章节中才能展现出来。

## 古村的研究缘起

1995年开始，我随着吉首大学人类学教授刘一友先生学习做社区调查研究。最初我是在刘先生指导下，做苗族聚居区的调查研究，所用方法也就是人类学中常用方法：访谈法、观察法及调查座谈会等。这个调查研究一直做了两年多，1997年，当我们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后，这项研究才告一段落。这一段调查研究给我的帮助很大。它使我能够熟练地进入调查程序，并保持好与调查者之间恰当关系。特别地，它坚定了我长期从事实地研究的信心与兴趣。自1998年开始，我开始独立地带领我的学生们进入实地从事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希望从调查中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那时太幼稚）。也希望获得对社会的更好地理解。我们在湘黔边区建立了许多调查点，希望长期地对我们的对象进行观察。在最初的调查中，我们遵循的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一般原则，对对象进行分层分类分期，然后再寻找这个对象在这些类别、层次、期间中发生社会变动的一般规律。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希望把每一个研究项目分成若干指标，对这些指标再分成若干变量，再通过这些变量进行观察或统计计算来实现对对象的理解。这些工作我与我的学生们做了很多遍，但结果并非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我们会获得我们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面对这些从来都在那里并且“我行我素”的乡村及有着各自苦乐的人民，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所使用方法的有效性。实实在在地，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的对象在这些年中正发生着明显地变化，但我们的调查却显示不出来。我们使用的方法适合静态描述及两个类型两个层次或两个阶段间变动的描述，但我们的对象却是连续性地变化，其变动轨迹很

难区分出明显的两种类型、两个层次、两个阶段等等。在这些调查过程中,我们的一项任务是社会语言调查,其结果正越来越具有启发性。即:人们的语言每年都有些区别,特别地,同样的语言在各个层次里有不一样的表达。这些区别与相应的行为体系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等等。我决定放弃原来的调查对象,专门调查语言变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语群的视角”。

研究语言(后来我们叫话语),需要我们对对象特别地熟悉。作为教师,我没有时间长期(数年)呆在同一调查点去熟悉记录所有社会语言。我必须确定自己一个最熟悉的调查点。经过反复比较,我终于选中了我的家乡。这样的选点本来也犯忌。传统的社区调查强调选择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社区,这样才能做到“价值中立”与避免“熟视无睹”。然而,我最终还是放弃这些成见。因为我必须做到对对象的熟悉,不仅熟悉到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熟悉与它有关的所有细节。这样一个调查,只好是我的家乡了。当然,近些年来,国内也有一大批同行,把自己的家乡当作调查点,取得了很好的调查研究成果。他们的工作也给我极大鼓励,使我相信这样做,有其合理性。我于是把目光从我们所建立的所有调查点收回来,专注于现在的这个点。

我们家乡是一个有着 1400 人口的古村。坐落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的西南方,距我的工作地 30 公里,在 209 国道东侧 5 公里。按照汉语命地名的习惯,地名都有某种意义。但我的家乡名字叫“都吾”,全称是凤凰县吉信镇都吾村。在它周围 5 公里以内还有 8 个村落(含自然村),它们的名字大致符合汉字的原意,惟有“都吾”不知何意。加之其历史悠久(见第一章),我们姑且把它叫着古村。这个村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这是因为:

第一,在武陵山区,行政村平均人口在 1000 人左右,自然村落平均人口就只有 600 人~700 人了。都吾村 1400 人口,算是较大的一个村。村中虽因耕种的水田分成几个聚居区,但边界相距不